



历史学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

董恩林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G256.1/15

2008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

董恩林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董恩林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622-3704-4

I. 中… II. 董… III. 古文献学—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963 号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

董恩林^① 主编

责任编辑:周柏青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 67867076 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8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6.25

版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200

定价:45.00 元

总 序

马 敏

历史学科历来是我校优势学科之一。作为学校前身之一的文华书院在1890年首开西洋史,至1931年,华中大学(由文华书院发展而成)开设的历史课程有中国史、现代欧洲史、希腊史、英国立宪史、日本史、印度史、西洋文明史、耶教(即基督教)史、佛教史、远东国际关系史等。在逾百年的历史中,可谓英杰荟萃、人才辈出,为培养中国的史学人才和史学教育工作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专业任教的学者,已过世的老一辈学人有著名文史专家钱基博、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等,现仍在执教的有国际知名的近代史专家章开沅、著名秦汉史专家熊铁基等,还有一批中青年专家也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经过数十年几辈学人持续不断的努力,目前历史学科已成为博士、硕士一级授权学科,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有国家级重点学科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育部新一届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亦设于此。

自1996年起,新设立的历史文化学院为满足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酝酿编写一套能够反映史学最新研究动态的比较系统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材。经过历史专业同仁近十年的努力,如今这一教材建设规划已初见成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即是这样一套以两部通史(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和若干专史组成的系列教材,其对象主要是历史系大学本科学生以及其他水平相当的历史学爱好者。

这套系列教材旨在使学生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过程,掌握历史的主要线索,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帮助学生构筑必备的历史专业知识体系,提高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奠定相应的基础。总的来讲,这套教材力求体现简洁、实用、准确、高质量的编写原则,并力争成为历史教材中的精品。具体而言,这套教材将追求以下特点和个性:

开阔眼界,突出整体史观。世界历史对中国历史来说是全局,中国历史对世

界历史来说是局部。世界历史有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也有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从中国的中国到亚洲的中国,再到世界的中国,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扮演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不可替代的角色;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不仅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认识中国历史也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因此,中国历史教学应当重视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一方面把中国历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去考察,另一方面把中国历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这样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和独特性,认识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重视变革,坚持发展史观。无论是中国通史还是世界通史,均上起二百多万年前前的原始社会,下迄刚刚谢幕的 20 世纪,时间跨度大,知识容量大,人物、事件多,不可能一一穷尽。再从中学历史教学来看,已有的教材已涉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多数基本内容,如果不考虑大学和中学两个阶段在知识上的衔接,必然造成教学内容的重复。因此,在通史教材编写中只能是取删繁就简、重视变革、重视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原则,在内容上做适当的详略取舍。同一般历史人物相比较,要更多地突出重要历史人物;同一般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历史上那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因其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求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诸如从氏族社会到王权时代,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分裂割据或区域性统一到全国性统一,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政权更替,从民族分离到民族融合,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等问题,都是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历史教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围绕这些重点问题开展课堂教学,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必备的历史知识,认识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正是历史教学本身的基本要求。

强化理论,加强宏观历史思维。目前社会有些通行教材,多以叙述历史为主,间或加进一些议论,缺乏应有的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相融合的历史理论,已成为课堂教学急需填补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们对历史教学的理解,单纯的历史叙述,或者简单的就事论事,必将导致宏观历史思维的短缺,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只有明确历史理论对历史教学的价值,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才能切实增强历史教学的理论色彩,较好地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与此相一致,近些年来国内外史学界有关思想文化、社会转型、商品经济、科技发展史诸层面的研究,涌现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成果同中国古代史教学密切相关,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提炼,进而融合到教学实践中去。这样做能帮助学生尽早接触学术前沿,尽快完成从中学学习向大学学习的转变。

就学习方法而言,本套教材强调如下四方面的重要性:

贯通分析。历史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上人类群体无论是阶级、阶层、还是集团,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总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一个群体消亡以后,又会出现另一个群体,如此循环往复,历史就在人类群体的生存和消亡中不断发展。同时,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实施国家控制,或者进行社会改造,总要分析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形势,进而制定出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实际上,老问题解决以后,又会出现新问题,如此循环往复,历史就在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中不断前进。环环相扣,前后贯通,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人们不能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历史教学实践中,运用对人类群体或事物发展的贯通分析方法,是帮助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和历史事件的重要途径。

比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既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历史教学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运用,通常表现为历史的纵向比较、历史的横向比较、历史层面的比较和历史区域的比较。历史比较的作用在于:一方面通过“求同”去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通过“寻异”去认识历史的偶然性,从而准确深入地解释历史现象、说明历史问题。譬如通过中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不间断性;通过国家统一和分裂的比较,可以说明这两种政治形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作用;通过礼和现实中同类问题的比较,可以说明这一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我们强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认为要达到对历史上某个问题的深刻理解,必须有对现实中同类问题的深切体会;反之,要达到对现实中某个问题的深刻认识,又必须有对历史上同类问题的深入探讨。所以,比较的方法是求得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认识的基本方法之一。

综合判断。历史是诸多因素的总和,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运动,综合判断对历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综合判断方法在历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往往可以成为帮助学生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譬如,对于一位历史人物,可以从其人格、素质、才能和功业等方面作出评论;对于一项社会制度,可以从它的内部结构、社会内容、特殊功能和实际效果等方面加以考察;对于一部文化典籍,可以从它的基本构架、核心命题、思想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加以解读;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从它的产生背景、成败得失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讨论。综合判断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历史问题。一般地说,认识问题的角度越多,对问题的认识就越全面,而对问题的全面认识,又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我们应当鼓励学生扩大知识面,尤其是掌握与历史学相关的学科知识,从而学会对历史问题作综合判断。

直观鉴赏。过去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一样,容易沿着两条道路走向两种

目标,这就是“找规律”和“还面目”。历史教学注重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注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若拘泥于此,在活生生的历史面前,就会显得十分呆板,毫无生气和美感可言。我们希望学生借助历史教材和课堂讲学,能够真正开阔视野,对历史有更多的直观感受,并在此基础上懂得如何去鉴赏历史、品味历史。这种鉴赏历史的方法包括熟悉不同版本的历史典籍、欣赏各类历史文物、参观历史博物馆和开展历史专业考察活动,特别是利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去领略真实的历史画面。这样做,对于学生来说不仅会加强学习历史的兴趣,还能提高对历史的鉴赏力,显然有助于增进历史教学的效果。

我们计划在五年内陆续出版一套高水准的“华大博雅”历史学系列教材,首批拟推出:

中国通史(古代卷)	赵国华、罗家祥主编
中国通史(近现代卷上册)	刘伟主编
中国通史(近现代卷下册)	黄华文主编
中国通史(当代卷)	孙泽学主编
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卷)	晏绍祥、李隆庆编著
世界通史(近代卷)	李其荣主编
世界通史(现代卷)	黄正柏主编
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	张全明著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	董恩林主编

教材建设是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本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兹事体大,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和随意。希望我们的努力能经得起广大同学和社会的检验,同时期望能够得到同行专家学者的指正。

是为序。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编写人员

主 编：董恩林

绪论、第一编：董恩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

第二编：曹书杰、李德山(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第三编：彭忠德、周德美(湖北大学历史系)

伍成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四编：郝润华(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韩 杰(云南大学历史系)

栾继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

陈晓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五编：邓瑞全、陈娜、张振利、李开升、史明文、

马振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目 录

绪 论	(1)
一、“文献”的内涵	(1)
二、“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名同实异	(4)
三、“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	(8)
四、传统文献学特有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体系	(10)

第一编 文献的形体认知

第一章 文献载体	(19)
第一节 甲骨	(19)
第二节 金石	(21)
第三节 简牍	(23)
第四节 缣帛	(26)
第五节 纸张	(28)
第二章 文献版本	(31)
第一节 版本与版本学	(31)
第二节 版本的类型	(33)
第三节 版本的版式	(48)
第四节 版本的鉴定	(51)
第三章 文献体例	(67)
第一节 文献的体裁	(67)
第二节 文献的通例	(73)

第二编 文献的内容实证

第四章 文献校勘	(82)
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	(82)
第二节 文献的讹误及其原因	(85)

第三节	校勘程序与知识准备	(89)
第四节	校勘的基本方法	(92)
第五节	校勘成果的处理	(97)
第五章	文献辨伪	(102)
第一节	伪书的类型及其产生原因	(102)
第二节	辨伪的意义与方法	(107)
第三节	历代文献辨伪的成绩	(117)
第四节	伪书的使用价值	(123)
第六章	文献辑佚	(126)
第一节	传统文献的亡佚	(126)
第二节	辑佚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129)
第三节	历代辑佚成就概述	(138)

第三编 文献的文理注译

第七章	文献标点	(148)
第一节	标点的重要性	(148)
第二节	古代句读与现代标点符号	(151)
第三节	文献标点的规范与方法	(158)
第四节	文献标点的困难与对策	(176)
第八章	文献注释	(180)
第一节	注释的起源与价值	(180)
第二节	注释的内容与方法	(184)
第三节	文献注释的术语与类型	(194)
第九章	文献翻译	(202)
第一节	文献翻译的源流	(202)
第二节	文献翻译的要求与方法	(205)
第三节	文献翻译的致误现象与原因	(211)

第四编 文献的检索典藏

第十章	文献分类	(223)
第一节	文献分类的源流	(223)
第二节	《七略》六分法	(225)
第三节	四部分类法	(227)
第四节	文献分类的其他尝试	(234)

第十一章 文献编目	(243)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243)
第二节 目录的内容与体制	(245)
第三节 目录的种类	(252)
第四节 目录的功用	(269)
第十二章 文献典藏	(274)
第一节 历代藏书概述	(274)
第二节 典籍收藏的标准与途径	(286)
第三节 藏书的保管	(292)

第五编 文献的二次编纂

第十三章 文献汇纂	(307)
第一节 汇纂丛书	(307)
第二节 汇纂文集	(316)
第三节 汇纂的方法与原则	(320)
第十四章 文献类编	(326)
第一节 类书的定义与类型	(326)
第二节 类书的编纂方法、体例与原则	(330)
第三节 历代类书编纂的成绩与不足	(335)
第十五章 文献抄撮	(341)
第一节 抄撮的特点与类型	(341)
第二节 抄撮的方法与原则	(346)
第三节 历代文献抄撮的成绩与不足	(350)
第十六章 文献选录	(358)
第一节 选录的定义与类型	(358)
第二节 选录的原则与方法	(363)
第三节 历代文献选录的成绩与不足	(369)
第十七章 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	(378)
第一节 传统文献面临的困境与数字化出路	(379)
第二节 传统文献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式与现状	(382)
第三节 传统文献数字化、网络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92)
附 录 中国传统文献学著作简目(1911年—2007年)	(396)
后 记	(406)

绪 论

20 世纪是文献学理论升华、学科成型、体系渐备之时^①。据不完全统计,仅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冠以“文献学”之名的专著就在五十种以上,至于没有冠以“文献学”之名而属文献学各分支学科范畴的论著则数倍于此。另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1978 年—1998 年文献学理论研究的论文达五百多篇,其中仅探讨文献学定义、学科体系的论文就不下百篇。这对于一个至今仍然不太为人所重的学科来说,成果已足够丰富。如今,文献学作为历史学、语言文学、图情文献学三大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已为学术界所接受、所熟知。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似乎越来越庞杂、范畴越来越广,甚至连学科名称、内涵等基本问题都是人言人殊、五花八门^②。其学科名称除习知的文献学、古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外,还新出现了理论文献学、应用文献学、技术文献学、普通文献学、综合文献学、单一文献学、大文献学等说法;至于其分支学科和专科文献学名称,更是花样百出,不胜枚举。究其致异原因有三:其一,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没有确切的界定,缺乏相对固定而明确的学科坐标。其二,在界定传统文献学理论诸范畴时,忽略了文献学脱胎于校雠学这一根本前提。其三,对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不分彼此,勿论古今,甚至试图糅合二者。下面就这些问题稍作分析与论证,以体现我们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

一、“文献”的内涵

要界定文献学的内涵,首先要弄清“文献”一词的含义。据现有文献资料

① 我们所理解的“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同一概念,并主张用“传统文献学”作为统一名称。所称“文献”、“传统文献”、“古文献”、“古典文献”、“历史文献”也是同一概念,并主张用“古文献”作为统一名称。理由见下文。

② 有关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混乱庞杂和改革的必要性,冯浩菲在其《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载《文史哲》2002 年第 1 期)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记载,“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礼记·礼运》也有类似的话语:“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夏时》,汉代经学家郑玄以为即夏代历法书,其残者有《夏小正》;《坤乾》,郑玄以为即殷代阴阳历法书,其残存者有类似《周易》的殷《归藏》。从此,“文献”一词成为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仅《四库全书》就可检索到一万一千多条。但是,“文献”一词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不仅一般民众不甚了了,就是学者们也众说纷纭。仅在现有社科工具书和学者论著中,对“文献”一词的理解归纳起来就有几种不同说法:有的指典籍,有的指典籍与口耳相传的资料,有的指典籍与贤才,有的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由于学科分工的细密与研究的深入,现代学术要求循名责实、辨义析理。故在现代学术条件下,“文献”一词含义的模糊,对文献学学科理论的升华与普及都是不利的,有必要对其含义作出明确的辨正与界定。

“文献”一词的含义之所以如此众口不一,我们以为原因之一便是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原本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是汉代大经学家郑玄对孔子上面一段话的注释:“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①可见,郑玄以“文章”与“贤才”来诠释“文”与“献”。从此,“文献”指典籍与贤人的含义广为流传,为学者所熟知。其二是南宋学者马端临在其所编《文献通考》一书中对“文献”的解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显然,马氏所谓“文献”包括三种历史资料:(1)正式印行的典籍;(2)未正式结集印行的官僚名士的零散章奏诗文等;(3)社会名流的谈话记录或采访笔录等。简言之,就是指正式印行的典籍和未印行的文字资料。这种诠释更为后世所接受,现在所理解与使用的古代“文献”概念的内涵正是这个范围。毫无疑问,郑玄与马端临对“文献”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献”的诠释不一,马端临释“献”为“贤才的论议记录”,郑玄则释“献”为“贤才”。令人不解的是,当代许多学者既服膺郑玄的诠释,又使用马端临的定义,往往是先述郑玄的诠释,接着归结为马端临的定

^① 见何晏《论语集解》引。

义，却对“贤才”是如何转变为“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这一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就造成了“文献”一词在同一学者或同一著作中既指典籍与贤人，又指典籍与其他口耳相传资料的矛盾与混乱现象。实际上，只要认真做一番“征文考献”的工作，就会发现，郑玄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首先，先贤们已经注意到郑玄注的问题所在，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文献”一词作的说明是：“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他并不直接解“贤”为“贤才”，表明其意向与郑玄是不同的，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近代学者刘师培也注意到了郑玄注的问题，在《文献解》一文中另辟蹊径，指出：“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今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仪之与文，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刘师培将郑玄所谓“贤才”解释为熟悉并能够演示礼仪制度的礼贤之士，由泛指转为特指，意思更为明确。当代学者王欣夫认为：郑玄注《论语·八佾》，用“文章”解释“文”字是容易理解的，用“贤才”二字解释“献”字则不好理解，“是根据《尔雅·释言》：‘献，圣也。’圣之与献，是同一意义。于是，‘文’与‘献’有不同的内容。据《春秋公羊传》卷一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以推知……周有百二十国宝书，这就是‘文’，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这就是‘献’”。又认为，孔子所谓“文献”是对“礼”而言的，而“礼”的范围极广，积累极富，要靠文章来记录。写这些文章的人自然是博学贤才，这些贤才又是创造或研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的，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材料都称为文献。刘师培“把献字解为一个人的动作，比郑玄更为明白”^①。张舜徽则直接把“献”理解为“耆旧言论”，包括口耳相传的故事和士人学者的评议等^②。可见，汉代以来的这些学者并不认同郑玄以“贤才”释“献”的说法。董恩林曾撰文《文献之我见》，指出“献”有“献进”之义，古有“贡献”、“膳献”、“羹献”等说法，“文献”之“献”即古代祭祀荐进之物中的“献进之文”，子夏等得百二十国宝书进献给孔子亦属其类，故孔子有“文献”之谓^③。其次，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杞、宋是夏、殷两个王朝的后裔之国，这两个小国的贤才对孔子考求夏、殷二代礼制有什么作用

①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一章绪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页。

② 参见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一编第一章，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页。

③ 参见董恩林《文献之我见》，载《文献》，1986年第4期。

呢？无非是他们能够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记忆，将夏、殷二代礼制复述或演示出来，以证实孔子从典籍或研究中得来的对夏、殷礼制的理解与体会。因此，孔子所谓“献”决不应是泛指意义上的贤才，而是那些既能熟记礼仪掌故，又能身体力行演示复述礼仪制度的专门人才所展示或口述的夏、殷礼制掌故。最后，也不能忽略另一个问题，即先贤言论必须有载体才能流传下来，“考献”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从活着的贤人口中得到议论话语，还应该包括这些人自己写下来的和别人录其口述的文字资料。任何议论话语只有通过文字记录才可能为人所取资。总之，“文献”之“献”应该是指典籍之外社会名流留下的言谈论议章奏诗文等文字资料，而不是单指“贤人”；孔子所言“文献”应是指“典籍与贤人的口碑野史记录”而不是“文章与贤才”，郑玄注可能曲解了孔子之意，抑或后世对郑玄的理解过于简单了。

“文献”一词含义歧异的原因之一，便是将传统“文献”概念与现代“文献”概念混为一谈。现代“文献”概念着眼于图书资料所含有用的知识与信息，1983年制定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信息”二字：“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显然，传统“文献”定义比现代“文献”定义要窄。一些学者在研究和撰述文献学论著时忽略了这种区别，也以国家标准为模式，如法炮制，将传统“文献”与现代“文献”本来很清楚的含义糅合在一起，试图总结出一种能够包括古今一切“文献”的定义，结果弄得纷繁复杂、不伦不类，出现了十几种“文献”定义，我们以为这是不可取的。

二、“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名同实异

我们再来看“传统文献学”的内涵。无论称为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还是古文献学、古典文献学，我国文史学界所称文献学，都是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职志的一门传统学问，过去称校雠学。“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①其所称“历史文献”或“古典文献”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历代文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基本宗旨，保障传世文献文本的完整、理解的准确是其终极目标，注重研究文献文本形态的价值与内容的真实是其基本特征。故从目的论来讲，传统文献学就是文献整理学，就是文献整理方法论。遍查现有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从汉唐刘向、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杜预、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颜师古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4页。

等,到宋、元、明、清郑樵、洪迈、王应麟、胡三省、胡应麟、阎若璩、胡渭、姚际恒、惠栋、戴震、纪昀、章学诚、王念孙、钱大昕等,历史上所有被称为文献学家的学者,其主要成就无一不在古文献整理范围之内。这是对文献学即文献整理学这一基本认识最简单而直观、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由校讎学到文献学,经历了一个必然的演变过程。校讎学发端于孔子整理六经,西汉刘向父子受命校理国家图书,开始了校讎学理论的探索。南宋文献学家郑樵《通志·校讎略》,则是第一本系统阐述校讎学理论的专著,总结了校勘、辨伪、目录、典藏等文献整理基本环节的理论方法。但到明代胡应麟撰《经籍会通》、清代章学诚撰《校讎通义》,已深感“校讎学”一名难以概括文献整理的理论与实践,刻意推广其义。民国初年,梁启超提出了“广义史学——文献学”的概念,视为治国学的两大路径之一。20世纪30年代撰成中国第一部文献学专著的郑鹤声、郑鹤春将传统文献学归纳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①。这个“文献”定义初看似与马端临所说有异,实际与马氏定义并无二致,因为郑氏在《例言》中先列出郑玄注和马端临的“文献”定义,声明“本编亦采其谊”,然后详解之曰:“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其全书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印刻六章结构是一幅典型的文献整理程序图。郑氏又在自序和导言中极论西学东渐对本国文化、文献之不利影响,痛心于所谓学人而不知本国文献之要略,指出:“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外邦文化侵略常以典籍为要,无论何国要以文献保存、研讨为根本。可见郑氏所谓“文献学”,目的就是倡导在外邦侵略面前要全力整理民族的传统的文献,借以传承民族文化。稍后的王欣夫也把文献学视为“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②,定其主要内容为目录、版本、校讎三大块,认为文献学的任务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整理古文献。张舜徽则先撰《广校讎略》以推广校讎学范围,后著《中国文献学》以括校讎学内容、扬“文献学”新名、推动古文献整理,把刘向刘歆父子校书、郑玄遍注群经,甚至司马迁整理群书而撰成《史记》,都看做整理古文献的工作,指出我们今天要继承过去校讎学家的经验与方法,对历代保存下来和新发现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

①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上海书店,1983年,第1页。

②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一章绪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页。

使之系统化、条理化、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程千帆、徐有富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校雠广义》四卷本鸿篇巨制,在《叙录》中历数汉唐以来文献学家有关校雠、目录、校勘、版本诸学高论,指出:“治书之学,旧号校雠。”“历祀最久,无妨即以治书诸学之共名。”但《校雠广义》书名中一个“广”字,足以昭示“校雠学”一名已不能适应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示出作者突破校雠学藩篱的意图,反衬出以“文献学”之名取代“校雠学”的合理性。故从古今文献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来审视,传统文献学原本就是广义校雠学,或可谓之“广校雠学”。其含义与任务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含糊。张舜徽讲得好:“‘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①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有别于传统文献、传统文献学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统的现代“文献”、“文献学”概念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有关现代图书情报文献学著作大量涌现。特别是1983年制定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为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由此而忽略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应有区别,试图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无所不包的大文献学概念与体系^②,以加强学科阵容与声势。研究传统文献学的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界限,不适当地借助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献学体系,从而使传统文献、传统文献学的定义与体系变得庞杂不定。

实际上,现代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现代文献学,如同现代其他许多学科分类一样,带有浓厚的“舶来”

① 上引张氏言论均见其《中国文献学》第一章,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4页。

② 有关论述颇多,可参阅柯平《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一、之二、之三,连载于《河南图书馆学刊》1995年—1997年第1期。该文总结了文献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区分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不同,提出“大一统文献学体系”的设想。有关大文献学还可参阅于鸣镝《试论大文献学》、《再论大文献学》,潘树广《大文献学散论》(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1、3、6期)。潘树广《文献学纲要》所云“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的学科”,是糅合传统与现代文献学定义的典型。